

●中美关系史丛书·译丛

伍德罗·威尔逊与 远东政策

1913—1921

〔美〕罗伊·沃森·柯里 著

张玮瑛 曾学白 译

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伍德罗·威尔逊 与远东政策

1913—1921

[美]罗伊·沃森·柯里 著

张玮瑛 曾学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34465

(京)新登字028号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by Roy Watson Curry
1968
OCTAGON BOOKS · INC.
New York

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
1913—1921

〔美〕罗伊·沃森·柯里 著
张玮瑛 曾学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新源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1.375印张 289千字
印数0001—1000

1994年2月第一版 1994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12-X/K·53 定价: 8.6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丁名楠

编委 乔明顺 邓蜀生

罗荣渠 张振鹞

资中筠 陶文钊

秘书 高士华

June 11, 1992

Dear Mr. Tao Wenzhao:

I am pleased to grant you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Woodrow Wilson and American Far Eastern Policy into Chinese.

I hope the translation will further the cause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Sincerely yours

Ray W. Curry

译者序

罗伊·沃森·柯里教授(Professor Roy Watson Curry)从事历史研究及教学工作多年,曾发表美国外交史、二十世纪美国史和美国内战史等方面论著多种。

柯里教授史笔谨严,叙事详实。作者依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大量国务院档案和內政部岛务科档案等官方文件以及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和耶鲁大学、普林斯敦大学、杜克大学等图书馆手稿部所藏的大量私人文件,并援引若干回忆录、论著、报刊等资料,系统地叙述和剖析了1913—1921年间美国远东政策,使本书成为了解和研究该时期内威尔逊总统及其远东政策的一部有重要价值的专著。

本书的翻译是在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的组织 and 协助下进行。陶文钊同志通过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与柯里教授取得了联系,并得到原作者同意翻译出版中文版的授权。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张汉槎先生的大力协助,又承符致兴同志校阅了部分译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限于水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予以指正。

译者

1993年9月

目 录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资金、承认和在中国的主张·····	(5)
第二章	加利福尼亚州的危机·····	(37)
第三章	对菲律宾的用人和政策·····	(59)
第四章	战争及其后果·····	(94)
第五章	日美之间的小冲突·····	(120)
第六章	战争与调整·····	(146)
第七章	新银行团与重重纠纷·····	(175)
第八章	西伯利亚问题上的争吵·····	(201)
第九章	巴黎、和平与东亚·····	(242)
第十章	进展·····	(278)
第十一章	结语·····	(305)
	参考书目举要·····	(315)
	外国人名、公司会社名汉译表·····	(341)

前 言

从1913到1921年，即伍德罗·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的八年间，远东不断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即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这些事件也受到美国人民的注意。事实上，在带来灾难的1914年8月欧洲狂热的军备竞赛在佛兰德斯这片古战场进行，从而使其他一切问题相形逊色之前，远东问题一直是公众注意的焦点。英俄联手反德的举措，削弱了远东的均势，使日本在远东坐大，成了那里的主宰。这样一来，美国惯于用来抵销他国力量以便维持其在华利益的列强三角关系格局也随之消失。日本破坏美国关于门户开放及其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传统政策，趁机在中国进行扩张。这就是威尔逊面临的问题。由于美国在东方处于明显的颓势，菲律宾便成了抵押品。随着欧洲列强卷入战争以及日本作为一员盟国也积极参与，使美国与欧洲列强合作的政策变得复杂起来。

此项研究旨在利用学者新近掌握的资料来重新描述当年发生的那些事件。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处置这些事件时并未超出传统政策的框架，而且是同美日之间的猜疑加深相因应的。在这些事件中，伍德罗·威尔逊是个中心人物。因为尽管他不是远东政策的创始人，却是他最后决定美国在远东采取行动。在对付种种事件时，他一方面恪守构成美国传统政策的固定原则，一方面采取灵活的手法。他的目的是为亚洲“服务”，而此逐渐也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地位。

我之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到兴趣，是由于受到杜克大学保罗·H·克莱德教授（Paul H. Clyde）的启发，对此我深表感谢。

他的指教和鼓励使这项研究能够得以完成。我对伍德罗·威尔逊这个人物感到兴趣，则起始于我那慈祥的祖母，已故的约翰·M·柯里夫人（Mrs·John H. Curry）。

在研究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人们的帮助。我对杜克大学图书馆、北卡罗来纳图书馆、国会图书馆以及国家档案馆诸位同仁致以谢忱。我特别感谢以下人员：亨利·M·富勒（Henry M. Fuller），耶鲁大学参考书图书馆长；亚历山大·克拉克（Alexander Clark），普林斯顿大学手稿保管员；凯瑟琳·布兰德女士（Miss Katherine Brand），国会图书馆威尔逊文件保管员。我对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允许我使用她已故丈夫的文件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我对耶鲁大学图书馆和查尔斯·西摩先生（Charles Seymour）让我使用爱德华·M·豪斯（Edward M. House）和弗兰克·L·波尔克（Frank L. Polk）文件中的资料表示感谢。我要为引用蓝辛文件深深感谢艾伦·W·杜勒斯先生（Allen W. Dulles）。乔纳森·丹尼尔斯阁下（The Honorable Jonathan Daniels）友善地允许我使用了他父亲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文件。

我也要感谢布雷肯里奇·朗阁下（The Honorable Breckenridge Long）对涉及的人物及事件所作的交谈；感谢劳拉·希勒·特恩布尔女士（Miss Laura Shearer Turnbull），关于威尔逊资料的颇有启发的交谈；感谢其他许多人，他们之不吝赐教和关心，使得此项工作富于人情味。我非常感谢玛格里特·内夫夫人（Mrs. Margaret Neff），她在技术上的帮助很有成效。

罗伊·沃森·柯里

匹茨堡，宾夕法尼亚

1955年5月19日

致 谢

作者衷心感谢

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特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允许引用奎松的《好的战斗》 (The Good Fight by Manuel L. Quezon) 及弗朗西斯·B·哈里森的《菲律宾独立的基础》 (The Cornerstone of Philippine Independence by Francis B. Harrison)。

鲍勃斯—梅里尔 (Bobbs-Merrill) 允许引用蓝辛, 《战争备忘录》 (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

道布尔戴—佩奇公司 (Doubleday-Page and Company) 允许引用雷·斯坦纳德·贝克编《伍德罗·威尔逊的生平与函件》IV及VI。(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IV and VI by Ray S. Baker) 及戴维·F·豪斯顿, 《威尔逊内阁的八年, 1913—1920年》, I. (Eight Years with Wilson's Cabinet, 1913—1920, I, by David F. Houston)。

哈考特—布雷斯公司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允许引用A·怀特尼·格里斯沃尔德, 《美国的远东政策》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 Whitney Griswold); 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by Paul S. Reinsch) 及《林肯·斯蒂芬斯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

霍顿—米夫林 (Houghton-Mifflin) 允许引用查尔斯·西摩所编《豪斯上校私人文件集》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edited by Charles Seymour)。

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允许引用石井菊次郎子爵的《外交余录》 (Diplomatic Commentaries by Viscount Kikujiro Ishii) 及哈利·诺特,《伍德罗·威尔逊外交政策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Woodrow Wilson by Harley Notter) 。

彼得·史密斯 (Peter Smith) 允许引用威廉·S·格雷夫斯,《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冒险 (1918—1920)》 (America's Siberian Adventure, 1918—1920 by William S. Graves) 。

斯克里布纳子公司 (Scribners' Sons) 允许引用雷·斯坦纳德·贝克的《美国纪事》 (American Chronicle by Ray S. Baker) 。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允许引用约瑟夫斯·丹尼尔的《威尔逊时代 1910—1917年的和平时期》 (The Wilson Era, Years of Peace, 1910—1917 by Josephus Daniels.) 及伍德罗·威尔逊夫人 (Mrs. Woodrow Wilson) 允许引用雷·斯坦纳德·贝克,威廉·E·多德合编,《伍德罗·威尔逊公开文件集》 I , VI.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I and VI, edited by Ray S.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

第一章 资金、承认 和在中国的主张

“小不敌大，寡不敌众，弱不敌强。”

——中国谚语

每一个被美国人民召唤到美国大总统这高位显职的人，必须以其本人的方式及在任时间，学习如何发挥这一行政职位的功能。他的职务繁多，责任重大，权力广泛，又没有确定范围。然而他所受到的训练又往往不足以应付这一重任。即便以伍德罗·威尔逊这样一位杰出的人，在1913年3月4日任美国第二十八届总统，也仍然是经验不足以应付其职责。

自1910年起，威尔逊任新泽西州的改革派州长，在这之前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法理学和政治学教授、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现年56岁，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在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入学，对战后的南方有深厚的感情，他是一位道德家，深深钦佩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许多人认为在纷争迭起的新世纪和进步党人大搞批评和自我检查而造成的动乱年代，威尔逊是主张改革的民主党人的旗手。

威尔逊是一位复杂的人，他的个性、动机和政策会被许多人去研究和解释。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个冷酷、武断和怀有野心的机会主义者。^①对另一些人，他则是一个热情敏感、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和有学者风度的人，他致力于利用当代的力量为本国和国外的进步事业服务。^②而在稍后，他则又被描绘为一个基本上是保守的人物，他趋附进步主义的政见，顺应潮流，在法律中制订了一些基本的、但也常会是不适当的措施，以解决我们国家的弊端。^③

当然，他在不同的时期内会是上述的各式的人，但他从来不会自始至终是某一类型人物。他个人并不欣赏人物的首尾一贯。^④他尊重传统的美国理想和目标，但是，他又接受社会是一个成长的有机组织的进化观点。^⑤他坚持道德原则是行动的指导这一坚定信念，提供一个指导他前进路线的永存的标准。但是他总是得当地完成他的目标。最初出现的是作为行动的基本原则与权宜之计的矛盾，但是他的看法是，“只有公正的，才是权宜之计，不过这只是另一方式说，那些符合行为和职责的现有审判标准的才是权宜之计。”^⑥他擅长于在方法问题上的灵活掌握，但在政策原则上他是坚定不移的。^⑦

他的才具主要在于他有兼容并包的雅量，而这一点则又有赖于他那好奇和敏捷的头脑。他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主要关键，并得出结论。^⑧他对一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解释说，这是作为发挥作用的行政人员的方法：

“行政人员是行动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如你和我”；他笑着说，“一个知识分子不是行政人员。对行政事务我们是危险人物，除非我们对自己的局限性有自知之明，并且采取措施去掉我们那种老是去想、去听而不去做的习惯。我很早以前便决定，只要我获得第一个行政工作，我便要有一段时间向每一个给我提供意见和情况的人敞开我思想的大门。待到有一朝一日我的想法决定后，我就不再听讲并开始行动。我的决定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这无关紧要，我要冒险试一试——做些事情。”^⑨

这种做法并不重视行动的前后一致，但尊重在道德原则的范围内有效地实现了的传统理想和传统政策，加上他那兼容并包的雅量，这些揭示了他这个人的复杂性。同时，评价他这些个人的品质，对了解他对国外和国内事务的决定，是非常必要的。

在1912年竞选运动的全过程，只是偶然地提及外交政策。民

主党的政策宣言对这一问题保持缄默，提作政纲之一的只是较小的问题——关于菲律宾问题和赞成国会对1832年俄国条约的行动。竞选是切实地以国内问题为基点，这是威尔逊认为可以应付裕如的问题。至于国际事务，他在就职前向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承认，“如果要我的政府主要处理国外事务，那真是命运的一种嘲弄。”^⑩

不幸的是，总统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事务只有极肤浅的知识。他到过英国两次，旅行时迅速经过法国，也在意大利国土上做短暂的停留。对于东方，他只有一般有识之士的学识。

面对东方的国家，他特别对中国感兴趣。^⑪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他依据庚子赔款基金的要求，主动录取中国学生。他本人也特别关注在北京的普林斯顿工作计划，通过这一计划，该大学支持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曾有不少东方学生来到普林斯顿校园。总统有一位姻亲吴板桥在上海主编长老会差会的周报。威尔逊也接待并和一些社会名流交往，听取他们谈论远东问题。正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把中国看为东方新觉醒的巨人。她那众多的人口和未开发的内地资源，为美国提供一个无与伦比的发展贸易的机会。^⑫

在11月大选之后，当选总统携夫人和三个女儿去百慕大休假。依据哈利·诺特所讲，威尔逊在那里研究东方问题，并设法和斯坦福大学的戴维·斯塔尔·乔丹会面讨论这些问题。他给《东方评论》杂志的主编写信，希望美国与日本之间建立持久的友谊。也告诉约翰·S·汤普森说，他在研究中国的形势，对中国的福利事业永远深表关心。^⑬对孙逸仙（中山）发来祝贺美国大选结果的信，威尔逊回答说：“请允许我对你说，我是以最热情的关注看到中国最近事态的发展，对每一个可望给予伟大的中华帝国人民自由的运动深表同情，这种自由是中国人民长期向往并为此而做出了准备的。”^⑭国际银行团贷款计划和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題，当时正在报纸上讨论。

当选总统从百慕大回来后，首批工作之一是要求威廉·詹宁斯·白里安加入内阁担任国务卿。白里安是民主党的老政客，少威尔逊三岁。^⑥这一委任对威尔逊政府初期的远东政策有深远的影响。许多情况凑在一起，促成白里安被任命为内阁的首席成员。这位被报界称为“伟大的老百姓”的白里安在全国的民主党员中有大量的追随者，他的影响和在政界中的友谊将会大有助于威尔逊通过政府的立法计划，这个计划早已在威尔逊头脑中明确构成。白里安在巴尔的摩支持威尔逊被认为是使威尔逊被选任新泽西州州长的重要因素。以白里安在民主党中的地位和政治责任，担任国务卿之职，非白里安莫属。^⑦

爱德华·M·豪斯上校也极力促成这一委任。豪斯是得克萨斯州人，家中富有，也热衷于政治，他在民主党召开提名竞选总统的大会之前，逐渐成为威尔逊的顾问。当选总统派豪斯去佛罗里达州，在那里白里安筹建自己的新居，去打听“老百姓”对威尔逊计划的看法。豪斯发现白里安，“真正是好人，并有民主党人的单纯、积极、爱国和一种热心宗教的天性。”上校给威尔逊写信说：“他完全接受你所做出的结论，态度是那么诚挚有礼，使我认为和他讨论问题是很愉快的。”^⑧

报界认为白里安个人的单纯和质朴性格对担任国务卿一职是有害的。但是威尔逊则从来都认为，国务卿是一个下属的职位，其实际行动则受命于总统。^⑨白里安对此似乎抱同样态度，也满足于承担威尔逊的副手角色。确实，明显的是在他们初期的行政关系阶段，两人都互相配合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两人更被一种强烈的共同观点联系在一起。

白里安象威尔逊一样，是个追求实际的公正与和平统治的理想家。两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也相信基督教义能够促使人们德行高洁，从而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也一致认为，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和个人发展机会。两人都惧怕大公司的财富（不论是在国家或国际水平上起作用的）会腐蚀美国人的理

想。他们所竭力服务的是正义、和平、基督教义和民主这些关键的理想。这些理想不但不会消失，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会日益与当前的现实协调起来。

与威尔逊不同，白里安因个人的经历多少有些了解东方。1905—1907年，这位“老百姓”携同全家做世界周游。那位曾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白里安家中并以白里安·山下^②命名的年轻日本人，在日本安排了一个盛大隆重的接待宴会迎接白里安一家。白里安作为贵宾出席庆贺日俄战争的英雄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的宴会。白里安是位严肃的戒酒者，在宴会上以水代酒来祝贺，他开玩笑地说：如果舰队司令的英雄事迹是在香槟酒中完成的，那我就以酒来祝贺。这位美国人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并且按照惯例向天皇鞠躬。白里安公开地称赞这位日本统治者给予他的人民一部宪法，并且稳步进入代议制政府。^③

白里安全家也访问了朝鲜，那时朝鲜正当被日本并吞的前夕。在中国，白里安发现这个老大帝国正在崩溃。白里安一家的行动很少受人注意。中国口岸城市的喧嚣、混乱与日本的有效率和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接着游览了菲律宾，发现美国思想在那里的影响在扩大，他们见到了艾米利奥·阿奎纳多，他是反对美国统治的领袖，是在最近才被招安投降的。白里安曾作为在美国反帝的代言人受到菲律宾人的尊敬，但他在菲的许多讲话比较拘谨，这使菲律宾人感到失望。^④白里安一行经由东南亚继续前进，经过印度、俄罗斯、欧洲回到美国。^⑤这位国务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观察世界的事务。

白里安了解他自己对国际事务缺乏经验，他劝说亨廷顿·威尔逊，这是一位被认为是远东问题的专家，曾在塔夫脱政府任职，此时留任为国务院的参赞。在威尔逊新政府开始工作不久，参赞威尔逊被召入白宫向总统陈述他对外交事务的意见。他盲目相信塔夫脱政府的“金元外交”。那天晚上他为要求承认墨西哥的胡安达政权而申辩，并要求政府继续支持在六国银行团贷款计

划的银行家，还要求不得承认中华民国。他受到冷淡的待遇，并且以后再没有被咨询过。这位参赞记得当时白里安忙于应付政治事务的约会，因而没有多余时间研究国务院本身的问题。他记得，后来他抓着国务卿，“那是一天晚上，在一个风寒的街角上，他试着向国务卿解释中国的国际银行团的错综复杂的情况。”^②

关于银行团贷款计划有许多问题要解释。威尔逊也了解谈判的经过，因为报章上已有大量的叙述。认为贷款谈判和承认所谓中华民国这两者是急待新总统解决的问题。

塔夫脱政府在贯彻其与在亚洲有权益的国家进行合作的政策时，曾试图在列强的政策中提高美国的声望。通过加紧美国对华投资，希望以此作为推动门户开放、维护中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和开展美国在华、特别是在满洲企业的机会。当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们组成银行团通过华中和华南地区，取得建筑湖广铁路的权利时，美国国务院也策划以J·P·摩根公司为首，组织美国银行团。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国际银行团勉强地接纳了美国银行团参加，这时是1911年5月。但是中国发生了革命，使铁路的动工修建延缓了两年，不过美国仍然分担了对这一事业的初期贷款。^③

在加入国际银行团后不久，美国银行团被邀承担提供资金以稳定中国和东三省财政的贷款。在中国方面的同意下，美国通过向国际银行团其他成员国开放这个计划，使这一贷款计划国际化。在提出的一千万英镑中，实际只预付了四十万磅。^④这笔款项以后要在1913年善后大借款的贷款中偿还，而目前对这一贷款的谈判成为各强国的重要利益。

新成立的所谓民国，负担大量债务，迫切需要财政上的援助，便转向国际银行团的银行家们求助借贷资金。在1912年2月28日到3月9日之间，约有3,100,000两的贷款由银行团贷给袁政府作为紧急援助。对这个援助的报酬，北京政府总统袁世凯向银行团保证，如条件与其他银行家同样有利，“银行团等有决定